

暨南史学丛书



缘来阁学史论稿

陈文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暨南史学丛书



缘来阁学史论稿

陈文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缘来阁学史论稿 / 陈文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203 - 2060 - 3

I. ①缘… II. ①陈… III. ①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文集
IV. ①D8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661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杨 林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94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记得孩童时，骑在牛背上，视野所及，不出沟壑丘陵；所忧思者，下顿可否得以裹腹。在那特殊的年代，上学只是某年龄段的分内事，小伙伴们可以在学农、学工、学兵的游戏中，掌握一些生活、劳作的技能，从来不曾想过以识字修文来改变“修理地球”的命运，因此，识字不多，亥豕不辨，“作文”也就成为上学最最头痛之事。然而，七七秋喜，国势运转，高考恢复，次年侥幸考入乡镇高中；毕业后经过两回冷饭翻炒，如愿上了大学；接着又北上长春，入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读研期间，曾修习文字、音韵、训诂、六经与诸子之学，有幸聆听如罗继祖、金景芳、王同策、吕绍纲、吴振武、丛文俊、陈恩林等鸿儒硕学之训诲。只可惜，乡野小子，天资愚钝，所悟不及十之一二。八八仲夏，心怀茫然，南迁花城，进入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冒忝教席，从事一项并不乐见的工作——向笔尖谋生计。

值得庆幸的是，刚入职时，创所元老陈乐素教授正在整理《宋史艺文志考异》，单位安排我协理其事。在陈老、常绍温先生的宽容与不倦垂训下，我对学术研究渐有所悟。后来又得汤开建教授的指导，先后参与整理编纂《东坡事类》《香港 6000 年：远古—1997》《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文献卷）、《今日澳门》等。其间还与张廷茂兄一起整理陈华等人遗著《海国图志校注》。可以说，参加工作的头十年，基本在故纸堆里爬行。直至 1999 年，草成《清中叶澳门额船贸易问题》一文，这是我首次对一个问题进行独立构思、撰写的研究论文，前后数易其稿。当时，不知从何而来的胆量，首次投稿就投往《中国经济史研究》。很意外，不到两个月就收到杂志社的采

用通知，这给我继续学术行程增添了不少信心。时任杂志主编魏明孔教授提携之恩，一直铭记于心。

2002年承蒙汤开建教授不弃，收纳门下。起初，很想追随业师的学术方向，从事澳门史研究，初拟题目是“明清时期澳门与越南关系研究”。然而，随着史料搜集的拓展，发现许多葡文、法文史料无法使用，不得不转而从事对外文要求相对不高的“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此后十余年，澳门史与中越关系史成为我所持续关注学术方向，我的思绪常常徘徊在澳门与越南之间。

在传统教育中，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和睦友好。但随着对中越关系史的关注日渐广而深，尤其经过一个月的越南访学后，愈发感觉到，在友好外衣的遮掩下，双方内心深处潜伏着一道难以名状的屏障。一直以来，我不断地思索个中缘由。为了避免“大国沙文主义”思维，我希望自己能以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审视历史上中越关系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时刻警示自己，要“站在边界左顾右盼”，排除旧有思维的干扰，细心考证中越文献记载的差异及其缘由，尽力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以期进行公正、客观的叙事。然而，我的努力似乎并不太成功，有好友曾善意提醒，在我的叙事中，中国优越感仍然十分明显。

进入澳门史领域大约始于1996年，当时参与业师汤开建教授所主持的古委会项目“澳门汉文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澳门回归前夕，澳门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大部分成果以宏观视野讨论澳门在中葡关系、中西文化交流、中外贸易体制与网络中的地位。相较而言，我更乐于探究澳门内部治理、经贸资源的利用与分配、社会民生、居澳华人的家国情怀等，尝试了解一个真实的澳门。

长期“脚踏两只船”，游思于越南与澳门之间，尤其近七八年来，受困于重点课题“中华大典·工业典·建筑工业分典”的整理工作，难以专注于一役，故所思不深，所得亦不厚。此次单位为支持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要求奉献优秀学术论文集，本不想参与，然转念思之，人过半百，是驴是马，总要牵出来遛一遛，任人评鹭，亦算人生之中期考，故勉强择取稍心得者共20篇（中越关系史与澳门史各10篇），汇而成集，聊以充数。还望前辈与同仁宽待于我，嘴下



留情。

在编辑的过程中，有几点仍须简要说明者：1. 所选论文均进行不同程度的修订，因此在内容上与原作会有所差异；2. 应出版社的要求，全书统一注释格式，为此所有引文全部重新核对。但部分原引典籍难以悉数觅得，在修订过程中有使用替代典籍或版本的现象，因此注释与原作有不尽相同之处；3. 本人学疏才薄，所论难登庙堂，唯与门下小子自娱共享，故部分论文原与硕士研究生联合署名，经整理后也在文末注明。4. 因内容不专，集名难取，适家有书屋三间，略备些许古籍今著与先哲时贤真迹。早前曾与内子商议书斋之名，最终取“因书得缘，缘来是福”之意，定“缘来阁”之名，故而本集取名“缘来阁学史论稿”。

丁酉孟冬于珠海岭南世家缘来阁

目 录

上 编

13—15 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	(3)
元明时期安南贡物“代身金人”考述	(17)
明朝士大夫的安南观	(25)
明初中越关系史实述论	(40)
明宣德弃守安南始末考述	(57)
明朝与安南战后邦交关系常态化交涉考述	(77)
莫登庸事件与明代中越关系的新模式	(91)
试析晚明对安南黎、莫政权之间的平衡政策	(108)
明清之际中越关系的演变与抉择	(123)
清朝藩国使团伴送制度述论 ——以安南使团为中心	(135)

下 编

闽商与澳门早期社会	(153)
16 世纪末澳门葡商共同体的成立与运作	(164)
16 世纪末居澳葡人议事机构成立的背景分析	(177)
明朝澳门关税制度考辨	(192)
清中期澳门贸易额船问题	(207)
明清时期广东政府对澳门社会秩序的管理	(225)



明清时期澳门人口、族群与阶层分析	(238)
近代澳门华政衙门之组织与职能演变	(255)
近代澳门城市街道管理的制度与措施	(272)
近代居澳华人的国民身份选择与文化认同	(288)

上 编

13—15 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 文化取向*

今之越南，乃古安南王国扩张发展而来。安南原内属于中原王朝，北宋乾德六年（968）丁部领乘中原内乱之机，宣布独立。然而，与形式独立相比，内治与意识之独立更具实质意义，因此，如何处理与中原王朝的统属关系与文化关系，自然成为独立后安南王国对华关系的首要问题。安南从国家形式独立到国家意识成熟，历经数百年的摸索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为削弱中原王朝的影响，挣脱其约束，既有模仿，也有对立，甚至经受了多次战争的洗礼。直至黎朝建立，最终选择了一条务实的政策，即内政独立与文化认同，与中原王朝保持一种形式上的、稳定的朝贡关系，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局面。因此，越南学者认为，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与中原王朝的对抗过程，其内涵主要体现为对抗外国军事干预的爱国主义精神。^①这种认识，至今仍是越南学界解析越南史与中越关系史的主基调。而中国学界大多侧重研究中华文化在安南的传播形式与影响，以及两国朝贡关系的形态，在学理上论述了越南乃中华文化圈之一分子。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安南追求独立自主的努力，并认为在安南士人的意识中，明、安关系是华夏系统内部的大国与小国的关系。^②这些成果均

* 本文为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危机与调适：明代中越邦交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YJA770004）的阶段成果。

① 参见〔越〕明峥《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范宏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 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71页。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但安南对中华文化认受过程有着十分复杂的心理，疏于对越南自主意识形成及其表现形式的深入探讨，就无法解释在“天下同文”的时空环境下，两国士大夫对双方政权之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所存在的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对中越关系史认识的迷思。本文尝试从安南王国的文化取向与国家独立意识的培养方面，探讨其处理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策略，这对理解安南与中原王朝的分合与纠结，或将有所助益。

—

安南立国以后，经历丁氏、前黎、李朝三代的发展，逐步建立了一套独立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初期，安南的社会组织与行政体系，主要仿效中原王朝的郡县体制。据《历代宪章类志·官职志》记载，丁朝的官吏有“都护”“土师”“将军”“牙将”等名称，其治理模式带有明显的郡县时代的色彩。前黎建立时，开始对行政架构进行改革，其所制定的文武僧道官制，“一遵于宋”。当然，改革是渐进式的，其中“总管”“都指挥”等职仍是承袭前朝的职能，而“太师”“太尉”等则明显带有宋王朝的中央机构的痕迹。至陈朝初年，开始大幅度地对宋朝体制进行复制，端平三年（1236），“定大臣官衔，凡宗室入政府，或太师、太傅、太保、太尉，或司徒、左右相国，皆兼授检校、特进、仪同三司平章事”^①。淳祐二年（1242），又对地方行政架构进行改革，“定天下为十二路，置安抚、镇抚正副二员以治之”。同时对基层与户籍也作出相应的规定。^②不仅如此，安南各朝用于区别官员官阶的冠服等级制度也“大概多遵宋时”^③。

至陈朝中后期时，国势稳定，中央集权日渐增强，其国家意识独立的愿望与日俱增。为了摆脱元政权的影响，从而谋求意识的独立自

① [越]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5，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发行，昭和五十九年，第327页。

② 同上书，第331页。

③ [越] 潘辉注等：《历代宪章类志》卷13《官职志》，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编号：A.50/2。



主，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使喃字系统化。喃字创造于 11 世纪。至陈朝时，统治者与士大夫为喃字的系统化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在文学创作中广泛应用，使之成为一种知识精英交流的文字。其早期的代表人物如陈太宗时的韩诠，史籍载，韩诠“能国语赋诗，我国赋诗多用国语，实自此始”^①。许多民间的乐曲也开始使用喃字创作。到陈朝后期，更是全面地推广喃字。胡季犛是安南当权者中推行喃字最积极的一员。洪武二十九年（1396），他以喃字作《国语诗义并序》，并将其作为范本，要求女师教授后妃及宫人，序中多出己意，不从《朱子集传》。^②此外，还亲自用喃字翻译《书经》中的《无逸篇》，让士子学习；规定朝廷寄往各路敕令和诏书也必须用喃字书写。^③目的就是要使喃字逐渐成为官方语言，最终代替汉字的主导地位。

第二，创立了国史院，专门负责编撰各个朝代的历史，开始注重安南国史的编撰工作。至元九年（1272），翰林院学士兼国史院监修黎文休完成《大越史记》的编撰工作。此书共 30 卷，记载自南越王赵武帝（赵佗）至安南李朝李昭皇之事。^④首次在官修史书中将安南建国的历史推前至汉代南越王赵佗的时代。

语言文字与历史是一个国家的灵魂，陈朝有意识地发展与推广自身的文字、编修民族的历史，试图从文化上割裂与中原王朝的隶属关系，并形成对等的地位，最终谋求意识上的独立。正如越南史学家所言：“这是一个在文化领域中的民族精神和独立意识的新的表现。”^⑤

第三，建立与中原主流文化有别的文化阐释体系。陈朝后期，胡季犛作《明道十四篇》，大略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文庙以周公正坐南面，孔子偏坐西向。又著有《论语四疑》，称韩愈为盗儒，谓周茂叔、程颢、程颐、杨时、罗仲素、李延平、朱子之徒，学博而

① [越]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 5，第 355 页。

② [越]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 8，第 471 页。又见吴士连《国史纂要》，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 A. 1923，第 92 页。

③ [越] 明峥：《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第 128 页。

④ [越]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 5，第 348 页。

⑤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第 248 页。

才疏，不切事情而务为剽窃。^①众所周知，明初统治者以理学开国，宋代理学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地位。解缙曾上万言书，奏请修书，以关、闽、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作为治国之端。^②胡季犛通过对明代主流学术意识的评鹭与批判，凸显其尊周孔而贬程朱的主张，这不仅仅是关于儒家学说的解释权争夺的问题，也是通过这些批判来强调其本土化的认知。陈朝末年的本土化教育无疑是颇具成效的，洪熙元年（1425），交趾布政司在向明廷介绍安南情形时，颇有感触地说：“（交趾）诸生颇知读书，然皆言语侏离，礼法疏旷。虽务学业，未习华风。”^③

在元末明初，安南陈朝没有完全恪守藩国的应有义务：王位更替，不按时遵例向明朝求封；与明朝的边界交涉，态度欺狂；侵犯明朝属国占城王国，因此，明初对安南的总体印象是“动以侮诈为先，非以小事大之诚，乃生事之国”。当时，明太祖虽说坚持早年所定下的不轻起兵伐的原则，但对安南也曾发出“彼恃顽不服，终且取祸，姑待之而已”的警戒。^④

陈朝末年内乱，胡氏篡权，王室后裔陈天平前来明朝求援。通过明朝与胡氏政权的反复交涉，依照双方协定，永乐四年（1406）三月十六日，明朝派遣广西都督佥事黄中等率精兵五千护送陈天平回国即位。但明军行至安南芹站时，遭胡氏伏军袭击，陈天平被劫杀。这一事件成为明朝出兵的导火索。明成祖以“兴灭继绝”为旗号，出兵安南，推翻了胡氏政权，并进行了二十余年的直接管治。针对安南陈朝、胡朝时所采取脱离中原王朝体系政策，明成祖在安南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将明王朝的行政系统、文化教育政策延伸至安南。在行政上设三司管治，形同内地。将安南前朝的苛政暴敛，悉皆除

① [越]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8，第468页。（明）邱浚《重编琼台稿》卷20评述胡季犛的言行曰：“毁中国儒教，谓孟子为盗儒、程朱为剽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8册，第412页）

② （明）解缙：《文毅集》卷1《大庖西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第598—603页。

③ 《明宣宗实录》卷3“洪熙元年秋七月己卯”，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91页。

④ 陈文源、吴平：《明初中越关系史实述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之，“擢用贤能，优礼耆老，赈恤穷独，革去夷俗，以复华风”^①。在文化建设上，首先消除陈朝、胡朝所营造的独立氛围，对安南文化进行了大幅度的整肃。永乐四年，明成祖下令南征总兵官朱能，一旦攻入安南，“除释道经板经文不毁外，一切书板文字以至礼俗童蒙所习，如上大人丘乙己之类，片纸只字，悉皆毁之，其境内凡有古昔中国所立碑刻则存之，但是安南所立者，悉坏之，一字勿存”^②。五年（1407）五月，又诏令总兵官张辅“遇彼处所有一应文字，即便焚毁，毋得存留”^③。其次，明成祖决定将安南的文化精英内迁。早于是年二月，就曾诏令张辅将“安南境内有怀才抱德、贤能智谋之人及有一善可称、一艺可用者，即广为询访，尽数以礼敦请，起送赴京，以备擢用”^④。据实录记载，张辅确曾落实明成祖的旨意，于九月，将安南“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至京”^⑤。十月，又将“怀才抱德、明经能文、博学有才、聪明正直、孝悌力田、贤良方正、练达吏事、明习兵法及材武诸色”者九千人，遣送到南京。^⑥再次，将明朝的郊祀、科举制度移植到安南。如在安南各府州县广开学校，设立文稷庙、百神、社稷等神坛，皆仿明俗，四时行祭礼。永乐十四年（1416），在安南各府、州、县分设儒学及阴阳医学、僧纲道纪等司，^⑦完备安南的教育体系。同时，又把明初官修理学书籍，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送至安南，颁发给各州县士子学习，勉励安南人参与明廷的科举考试。

在管治安南的二十余年里，明朝逐渐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行政、教育制度，其目的是要使安南“再睹华夏之淳风，复见礼乐之盛治”^⑧。惠特莫尔研究认为，15 世纪初，明朝对安南的管治为宋明理

①（明）邱浚：《重编琼台稿》卷 20，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48 册，第 417 页。

②（明）李文凤：《越峤书》卷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62 册，第 695 页。

③ 同上书，第 708 页。

④ 同上书，第 703 页。

⑤ 《明太宗实录》卷 71 “永乐五年九月癸酉”，第 997 页。

⑥ 《明太宗实录》卷 72 “永乐五年十月丁亥”，第 1001 页。

⑦ 《明太宗实录》卷 176 “永乐十四年五月丙午”，第 1924 页。

⑧（明）李文凤：《越峤书》卷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62 册，第 705 页。



学在当地立足和发展铺平道路，导致安南接受明朝的管治模式，其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 明朝对安南的管治虽然失败了，但其治理政策与措施，客观上也成为安南复国后的管治基础。

二

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宣布弃守安南，明朝军队撤离安南，使安南重新获得独立，其军事首领黎利建立了安南历史上的黎朝。黎利在审视中越关系发展历程后，并没有沿袭陈朝、胡朝的与中国对抗的政策，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明朝治理时期的管治体制与文化成果。从黎朝的历史来考察，不难发现，黎利及其继承者的对明朝策略就是主张文化认同、政体独立。这种策略无疑是理性、务实而且自主的，也使得中越关系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能稳定、平和地发展。

黎利的治国方略，与陈朝、胡朝有明显不同。在文化理念上不再追求标新立异，凸显其与明朝的对立的意识，而是务实地处理与明朝的关系，特别是文教与行政，一切奉明朝制度为主臬。越南史学家认为：“封建政权以儒教作为建国的典范，作为建立各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金科玉律。”^② 黎利于立国之始便选择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确立了孔子的地位。《大越史记全书》载：“太祖立国之初，首兴学校，祠孔子以太牢，其崇重至矣。”^③ 此后，黎朝诸帝多次扩建京都的文庙，坚守孔子与儒学的尊崇地位。宣德十年（1435）二月五日，黎太宗“命少保黎国兴释奠于先师孔子，后以为常”。成化八年（1472），黎圣宗又将每年祭孔的盛典推广至地方，规定各府每年春秋两次举行祭典。^④ 其有诗曰：“九州何莫非王土，志大蛟螭孰可拘；

① [美] 惠特莫尔（John K. Whitmore）：《交趾与程朱理学：明朝改革越南的尝试》（*Chiao-chih and Neo-Confucianism: The Ming Attempt to Transform Vietnam*），《明代研究》第4卷，1977年，第51—91页。

②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第323页。

③ [越]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11，第577页。

④ [越] 潘清简：《钦定越史能鉴纲目》卷22，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69年影印本，第2234页。其曰：“旧制诸路文庙丁祭未有定期，至是准定各府递年以春秋两仲上丁行礼。”



敦笃化原贤孔孟，商量诡道薄孙吴。”^① 表明其对孔孟圣学的倾慕，及对孙吴诡道之术的鄙视。《蓝山实录》对黎圣宗有这样的评价：“（圣宗）自入继大统，天资聪睿，圣学高明，凡五经四书、百家诸子，无不贯通；崇师重道，爱民好士，内迪文教则修政立法，以为太平之制。”^②

黎朝诸帝对儒家学说认受可谓身体力行。黎利曾与群臣检讨其成功之道，一致以为关键在于施行“仁政”^③。受其影响，黎朝的精英阶层中普遍认为，儒家学说是立国立人的根本。黎朝著名史臣吴士连对胡季犛的意识导向曾提出尖锐的批判，曰：“前圣之道，非孔子无以明；后圣之生，非孔子无以法，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而敢轻议之，亦不知量也。”^④ 黎利的开国谋臣阮廌在《贺归蓝山》一诗中写道：“权谋本是用除奸，仁义维持国世安；台阁有人儒席暖，边陲无事柳营闲。”^⑤ 即使后来被斥为篡逆之臣的莫登庸亦认为：“三纲五常，扶植天地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国而无此，则中夏而夷狄；人而无此，则衣裳而禽犊。自古及今，未有舍此而能立于覆载之间也。”^⑥ 可以说，有黎一朝，在其主流意识中，孔子思想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为了向全社会推广儒家学说，黎朝首先从教育入手，扩充学校，修葺文庙，设立秘书库以贮藏儒学经典及雕版印书。黎圣宗鉴于当时监生治《诗》《书》经者多，而习《礼记》《周易》《春秋》者少，成化三年（1467）特设“五经博士，专治一经以授诸生”^⑦。而在所有的措施中，完善科举取士制度成为黎朝诸帝的重要政务。黎朝规定

① [越] 国家社会科学与人文中心汉喃研究室编：《黎圣宗总集（汉文诗）》（*LÊ THÁNH TỔNG TẬP*），（河内）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② [越] 阮廌：《蓝山实录》“附：大越黎朝帝王中兴功业实录”，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VHC.01356。

③ [越]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11，第565页。

④ [越]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8，第469页。

⑤ [越] 阮廌：《抑斋遗集》“贺归蓝山”（其一），《阮廌全集》第1册，（河内）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⑥ [越]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15，第815—816页。

⑦ [越]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12，第662页。